

专题

◀ (上接7版)

1980年代大家热议“新三论”“老三论”，他说，什么论都代替不了读书，你们不用听那些时髦的东西，你们就好好读书。

方辉：他挺喜欢用比喻，比方说谈到田野考古的时候，他经常会用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和飞行技术是成正比的，来强调田野考古的重要性。飞几十个小时，与几百个小时和上千小时的飞行员，他们的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在野外也是一样。经历过这种锻炼之后，你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。

他还有些很独到的观察。像《古代庭园植树与观赏养鹤》这篇文章，从文献到图像，给它建立一个联系。一般人可能注意不到这么多的细节，而他是小中见大的。我觉得这和他读笔记小说有关系，他的阅读和很多人都不一样。

郑岩：他睡前都会读几篇《太平广记》。一方面是消遣，一方面他认为这里面有大量的史料。他常常利用这些史料反过来再去讨论早期的东西，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参照。他从这里面生发

出了很多后来的研究，比方说科技史、环境、神话的研究等等。还有风筝的研究。潍坊风筝博物馆，请他指导，他就花了很多时间把读过的关于风筝的资料全都整理出来。

他很喜欢看侦探片，他说我们研究古代就和破案一样。另外他还喜欢看电视上的《动物世界》节目，因为他要研究古代的动物。他是很渊博、又很有情趣的，一个好玩的学者。

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。他不经营，但是非常有责任感。我曾经问过他，您是学西画的，怎么后来就做起中国研究来？他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，中国人怎能不做？

他最后还是留下很多遗憾的，他还有好多事没做。他是最早用“美术考古”这个词的学者之一，但他说这不是一个人，也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事，我们要一点一点积累。他是特别真诚的人，非常真实，不会夸大自己做的东西。

方辉：他写文章，要积累好多年。他说一个问题就像一个麻袋一样，不断地往里头丢资料，最后快封口的时候也就是把文章写成的时候。“文革”期间不可能写

作，但可以不断积累，到了1980年代以后就到了扎口的时候，所以到后来他就成熟一个扎一个。到他去世的时候，他实际上还一直在写。

即使在病重期间，他每天还是坚持写作一两个小时，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，他还是拼命坐到自制的轮椅上坚持写作。因为他有很多的想法、很多的麻袋还敞着口，没封口。那时候我们的副校长乔幼梅老师去看他，他说有很多事没做。看着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，很欣慰，但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还有好多没有做完，不舍得走。

郑岩：刘先生生前就出了一本书，就是一个集子。要不是台湾的学者帮忙，他这一辈子连一本书都出版不了。最后的日子，他让儿子把书拿到医院去。他说，把这本书给我拿过来。他把书放在胸前抚摸，就跟摸自己孩子似的，摸一会儿再放下，然后再拿来，继续抚摸着。学术，比他的生命还重要。

(本文图片均由刘陶先生和山东大学博物馆提供，谨此致谢)



1980年代初期，与同事们一起看画。左起：刘敦愿，葛懋春，韩连琪，王仲华，郑鹤声，张维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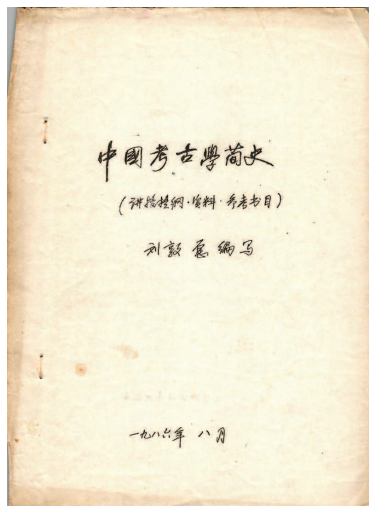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代，刘敦愿陪同黄景略(右)、宿白、徐苹芳、张忠培等一同参观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文物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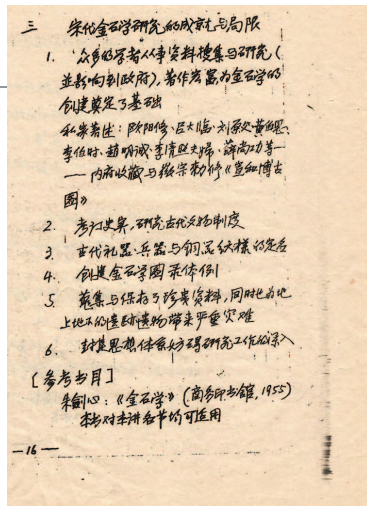
1987冬，与学生们在丁公遗址。左起：方辉，刘敦愿，栾丰实，许宏。



1988年，与郑岩在家中合影。



▲刘敦愿编写的《中国考古学简史》课程讲义，1986年8月，封面与内页



▶刘敦愿为这一专题所作的剪报

